

洋务思潮中的三种西学观

○ 周辉湘

19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洋务思潮,出现了许多立论不同又互相关联的西学观,影响较大的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论。

西学中源说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明朝后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在进行宗教活动同时,编译自然科学著作、西方历法等,不同程度传播了西方科技和文化。这些举动在明末清初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守旧者视之为“举尧舜以来中国相传纲维统纪之最大者而欲变乱之”,包括一些开明思想家也起而攻之。王船山曾论及:“西

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剥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道理之可守也。”^①他认为利玛窦带来的西方科学“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②。一些认为西学有可取之处的人也试图证明西方历法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传播到西域后反而在本土失传。西学中源说也就作为一种反对和赞成西学的混合物问世,构成中国思想界对中西学关系的第一次反响。这正反映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水平,把西学看作是对中国文化的剽窃,而且仅得到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一点皮毛。在他们心目中,不存在中西学的优劣之比,更谈不上对西学的引进。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沉寂多年的西学

(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的广大地区设置羁縻州府安置突厥降众,仍由原突厥贵族统领。颉利可汗被授以右卫大将军,并赐以田宅,随颉利来降的部落首领都被委以将军、中郎将之职,据《贞观政要·安边》记载,当时位五品以上的突厥将领达百余人,几乎占了朝臣五品以上官的半数。此举使北方最强大的敌对势力成了大唐的臣民,广大的突厥故地以民族自治的方式纳入大唐帝国的版图,成为北方的屏障。

唐太宗在处理与吐谷浑、吐蕃、薛延陀及西域诸部等少数民族关系时,有的采取与对东突厥同样的方法,有的根据情况有所不同,但都贯穿着“抚九族以仁”的指导思想,力图做到务使少数民族心服,因此增强了周边各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如贞观四年(630年)灭东突厥后,“四夷君长”请求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各民族的共主。由此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

《资治通鉴》卷198载,贞观二十一年

(647年),唐太宗在翠微殿曾问群臣,为什么“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群臣只知歌功颂德,于是唐太宗自己说出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番话。不错,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的确是其民族政策成功的原因之一。唐太宗能够以较平等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尽量减少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

但是应该指出,“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是唐太宗朝君臣在考虑民族问题时的另一共识,说明在唐太宗内心并未将“中华”与“夷狄”视为真正意义的平等;而且唐太宗的“抚九族以仁”又多是在武力征服之后所为。故在评价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时,还要实事求是,虽不应苛求,也不宜过分拔高。

(作者单位:天津《今晚报》编辑部
唐山市唐纲龙华中学)

中源说再次抬头。60至70年代一大批洋务思想家,除个别人外,大都为西学中源论者。粤人邹伯奇首倡“西学出于墨子”^③之说。1861年,冯桂芬也强调:“中华扶舆灵秀,磅礴而郁结,巢燧羲轩数神圣,前民利用所创造。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籍余。”^④之后,奕訢、文祥、张自牧、郑观应等对西学中源诸多论述,构成了洋务思潮中第一种西学观。西学中源之所以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源于60年代初期要解决学不学西方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尽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魏源的师夷论,但并没有在思想界引起反响,被搁置了近20年。60年代初,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师夷的重要性,但顽固坚持纲常名教,反对西学的封建守旧势力更强。分歧焦点就是对待西学的态度。倭仁等人所持的仍是“夷夏大防”、“华夷之别”,坚决反对任何引进西学的尝试。奕訢等人所用的是《易经》的变易观、经世致用之说。然而,经世说毕竟是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想,它在保持传统儒学本体前提下,运用儒家经典和历朝故事,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通常在社会危机严重时,经世之说不绝于耳。60年代初期,包括倭仁等人在内,并不反对经世致用。著名经世派儒学大师梁启超也是用这套理论反对师夷说,他指责“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不曰以夷制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熟甚?”因此,他的结论是,“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⑤。如何使西学合法进入中国思想界,这是洋务思想家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于是,借助于“西学中源”,为反击顽固派提供了有力武器,也给引进西学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光绪初年,张自牧作《瀛海论》、《蠡测厄言》,详细论证西学源于三代圣人和诸子。大抵从60年代开始,直到20世纪初年,西学中源说在中国思想界流传了近半个世纪之久。它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服务于西学东渐的需要。既然西学出自中国古代圣贤,而在中国又已经失传,就可以“礼失而求诸野”。向西方学习非但不是数典忘祖,而是求诸圣贤的堂皇之举。“合中西为一心,则异柯同木,异派同源,并非舍己以从人,

背师而他学”^⑥。说到底,西学中源的意义不在于学术价值,而在于政治蕴义。思想家们似乎也意识到了,张自牧较含蓄地说:“名之为西学,则儒者动以非类为羞,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是在乎正其名而已。”^⑦宋育仁则更直接道出真情:“今取证于外国富强之实效,而正告天下以复古之美名,名正言顺,事成而天下悦从,四海无不服。”^⑧可见,冲破思想樊篱,师事外洋,大胆引进西学,西学中源说确实起到发聋震聩之功。然而,它的理论毕竟是荒唐的,带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误区,又构成向西方进一步学习的障碍。其最大缺陷在于严重束缚人们的西学视野,把西学简单地比附中国古代一些诸子百家、科技著述,容易导致从故纸堆去寻西学真谛的倾向,因而无法真正了解西学全貌,把西学东渐引向歧途。另一方面,西学中源说又容易为顽固派接过去作为反对西学的武器。屠守仁就提出,既然西学为中学固有,根本之图仍在于让士大夫潜心研究古籍,探本溯源,何必多此一举去师事西洋?刘锡鸿从海外考察回国后,更振振有辞以西学中源论证“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教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⑨。西方还是事事不如中国,中国大可不必背师他学。

1878年,马建忠率先批评西学中源,“夫泰西政教,肇自希腊,而罗马踵之”^⑩。80年代,钟天纬著《格致说》,详细论证西学源流。指出:“考西国理学,初制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态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⑪他详细介绍亚里斯多德、培根、达尔文、施宾塞等人的学术渊源和思想体系,从理论上否定了西学中源。徐仁铸则从中西文化不同源流探讨,认为“西人艺学原本希腊,政学原出罗马,惟能继续而发明之,遂成富强;我中土则以六经诸子之学;历数千年暗昧不彰,遂以积弱。”^⑫在探索过程中,很多人转向用中国哲学体用、道器论观察西学,得出西学自有本源和本体的结论。由西学之源到西学之本,思想界对西学中源的扬弃,把西学东渐推进了一步,终于使西学的引进变成合法,并引出洋

务思潮中又一新的中体西用西学观。

二

体用论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宋代教育家胡瑗把它运用划定封建文化、政治制度的内在关系,明述体用之说,规范“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体也,举而措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用也”^①。尽管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1895年,早在60年代初期涉及西学,就有很多人运用道器、本末、体用范畴来探讨、界定中西学关系。并逐渐形成洋务思潮中一个重要的西学命题。

19世纪下半叶,很多人对中体西用有各种不同释义,其基本含义仍是确立中学与西学相互关系的文化学概念。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王韬“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③;薛福成“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④,都以不同角度表达中体西用思想。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和浓郁东方文化特征的国度,只要引进西学,就必定要遇到西学与传统文化相互关系问题,回避是不可能的。奕訢办同文馆就强调只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技艺,学生必须课以四书五经,不宜“数典而忘”。曾国藩最早派留学生出洋,也强调“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⑤。直到孙家鼐加以完整概述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⑥他们办学的总方针,就是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中体西用的西学观较好地解决了引进西学初期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它体现了时代客观要求和人们对客观的主观反映程度。“时在咸丰初元,国家方讳言洋务,若于官场言及之,必以为非丧心病狂必不至是,于是虽有其说而不敢质之于人。”^⑦人们的普遍观念仍是中国文武制度优于外国,这时提倡西学,首先必须肯定中学的地位,保护纲常名教的正统。同时,中体西用又是第一次从理论高度将中西文化放到一起考虑,确定引进西学的地位,并力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解决引进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的矛盾冲突。

应该肯定,中体西用从一个侧面较好地解决了对西学选择吸收的问题。事实上,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化融合现象,都是一种再创造,是外来文化与内在文化的结合。结合的过程同时又是矛盾冲突的过程。这种辩证关系,恰恰由中体西用曲折地反映出来,又适宜地暂时理顺了。

然而,中体西用的时效毕竟是短暂的,这种西学观适合引进西学初期的实际,却不能作为长久的中西学关系规范。它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并随着西学东渐的加深而日趋暴露负效应。从社会心态看,它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的虚骄情绪,保持封建传统文化的正统、主导、神圣,把西学作为巩固传统文化的手段。把两种性质不同,内在差异很大的文化观念硬性揉合在一起,势必造成文化的夹生。它始终把西学当作辅用、从属,与西学中源一样,限制了人们的西学视野,无法领会西学真谛,因而只学皮毛,不求甚解,新瓶装旧酒,容易导致引入西学的异形。而关键还在于这种异形的中轴点是封建文化的认可和需求。任何一种先进文化必定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再创造。主观地强行把各种文化体系优劣评判,达不到中西文化精粹的完美结合。事实上,许多洋务思想家同时又发现了它的弊端而对此进行批评。宋育仁指出:“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⑧钟天纬认为,“刻下中国设局置厂,制造枪炮丸药,兵船铁甲诸多,非不借用西法,刻意经营。但外强中干,徒得其糟粕枝末,而未尝窥其精微,仍是粉饰习气。”^⑨他们检讨中体西用的同时,用道器、体用互相转化的朴素辩证法分析中西学各有体用,中学有体用之分,西学也有体用之别,西体可以渗透于中体之中,中有西,西有中。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洋务思潮的又一种西学观——西体中用论。

三

西体中用论产生时间较晚,是在检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基础上,到80年代才逐渐形成的一种西学观。1884年,郑观应在《南游日记》中指出:“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

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练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②他第一次提出了引进西学必须体用并蓄、以西体为主的思想。郑氏之言一出,前两广总督张树声即采纳,在同年10月的遗折中几乎原封不动照搬郑观应的話,明确概括为“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③,形成了在中体西用框架中采西体为中用的西体中用观。而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这种西学观反映70年代后西学东渐的一些新特点。一是许多人远涉重洋,实地接触了西方社会和政治制度,对西学的认识由浅表转向较深层次。二是在洋务运动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暴露种种弊端。洋务思想家常常一身而兼数任,他们直接参加洋务运动,同时又站在思想高度鸟瞰洋务进程,发现西学东渐未能突破政治改革这一弊端。

1877年,马建忠致书李鸿章,指出西方“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救强者以得民心为次要”。“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④。1800年,郑观应《易言》中专立一篇《论议政》,指出:“泰西各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近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若两院意见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⑤他们对议院的了解,不仅远远超出林则徐、魏源的水准,也超出了冯桂芬等人。更重要的是,把议院看作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某种向往之意。陈炽指出:“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⑥由赞赏转而为要求在中国实行,当首推郑观应阐述:“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⑦何启、胡礼垣也认为,“中国而欲富强,必须先立其政矣。”^⑧这些论述构成了西体中用观的核心:西学自有体用,其立国之本在于议院。中国欲富强,必须仿行议院,改革政治。诚然,他们对西方议院的了解仍是不深

刻的,只涉及一些外表,而且又按着中国古代所谓议政模式去生搬硬套,与议会民主制相距甚远。但他们至少是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它,视其为一种较好的政治制度,隐隐约约地反映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满和要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模式的改革,可以说是两千多年来首次真正涉及对封建国体的改造问题。他们是用完整的议会制还是变形的议会制,似不必苛求。

与政治上的议院为本相联系,是经济上以商为本。洋务思想家对商本的认识基于三种考虑。首先是外国侵略的不断加剧,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与之进行商战;其次是由于清政府长期沿袭农本商末,对工商业限制的政策,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们要求解除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再其次是在洋务派资本主义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中,逐渐表现官督商办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民间资本的诸多限制,促使他们要求废除官督,任由商办。他们把经济改革的眼光放在商本上,发展工商业。郑观应指出:“如朝廷有体恤商贾,任天下之人自造轮船……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⑨薛福成认为欲自强,“莫不如振兴商务”^⑩。陈炽说:“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⑪他们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保持高度警惕,把商战作为自强之本;同时,又对清王朝的抑商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指责官督商办是不能护商反而病商。清政府有困商之虐政,无护商之良法。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经济改革的强烈愿望。

要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首要任务是培养改革的人才。洋务思潮发展中,把兴办近代学校,培养资产阶级人才放到了重要位置。与初期创办的同文馆不同,思想家们羡慕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制度。郑观应认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⑫他论证西方学校层次分明,从小学(乡学)到大学,各有不同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是一套考试制度,“虽王子国戚亦与考试”。他把西学与中学进行比较,指责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钳制学术,限制人才脱颖而出,阻碍了对西学的了解和精通,“彼萃数国之才,穷百年之智力,擢亿万之

资财,而后得之,勒为成书,公诸众而不私诸己,广其学而不秘其传。今中国所设之同文馆、广方言馆,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精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巧之兵船,造一新捷之火器者。”^⑩他们看到西学精华在其本,遗本逐末是学无成效的根源。因而,当务之急是学西方的富强之学、富国之政、富民之道,从而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四

西学中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是洋务思潮中三个重要的西学命题。三者互相联系,各有侧重。它们的联系在于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中西学关系这一课题,为引进西学,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在近代思想史上上继林、魏,下启康、梁,把师夷制夷发展到新的理论高度,又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先导。

同是处理中西学关系,但各自侧重点并不一样。西学中源所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学西方的问题,其目标对准封建顽固派反对“师事外夷”而发,是为了开启一大批封建士大夫,使他们从闭关自守的传统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承认西学的价值和地位,进入西学东渐的行列。中体西用侧重于怎样引进西学,试图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结构揉合起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结构。西体中用则是对前两种西学观的扬弃和发展,它要解决的议题是把学习西方引向纵深。

西体中用是对西学中源的扬弃,扬弃中有继承,继承中有矛盾。更多知识分子时常陷入自己用这两种理论交织的网络之中。郑观应的思想集中反映了这一点。1880年,他解释西方议会制度“颇与三代法度相符”^⑪。1884年提出西学自有体用,倡导采西学之体为中国之用。1894年又津津乐道于“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机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⑫。他们力图把西体中用融合到西学中源之中,从而使向西方学习的深化更具有理论权威性。同样,西体中用是对中体西用的发展,发展中有突破,突破中有保留。他们试图在保留中体西用框架的基础上实行西体中用,把西体中

用融合到中体西用之中。“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⑬。大本末是中体西用,小本末是西体中用。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只要把西体变为中用,既可越过进一步引进西学的障碍,又能保留中体的主导地位,他们不考虑或是不承认,中体与西体的矛盾在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框架中都是无法调和的,采用西体势必破坏中体,固守中体势必排斥西体。理论的不足源于19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环境和洋务思想家的阶级地位。这种状况迫使他们时常从封建文化的思想库寻找自己所需的武器,或加以必要的牵强附会的重新解释。更何况,由于西学东渐的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思想家们又必须担当拨开重雾,指点迷津的责任。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同又相近的西学观。

① 王船山:《思问录》。

② 《周易外传》卷5。

③ 邹伯奇:《学计一得》卷下。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⑤ 梁启超:《夷氛纪闻》卷5,第172页。

⑥ 《时务分类文编》卷13。

⑦ 《皇朝经世文编》卷102,洋务2。

⑧ 宋育仁:《时务论》。

⑨ 钟叔和:《走向世界》,第245页。

⑩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纪行》,《巴黎复友人书》。

⑪ 钟天纬:《别足集·外篇》,第90页。

⑫ 徐仁铸:《首轩今语》,《蓄艾文编》卷72。

⑬ 《宋元学案·安定学案》。

⑭ 冯桂芬:《采西学议》。

⑮⑯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⑰⑱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商政。

⑲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⑳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7。

㉑ 《庸书内外篇·自序》。

㉒ 《皇朝经世文编》卷1。

㉓ 《南游日记》,《郑观应集》上册,第967页。

㉔ 《张靖达公奏议》卷8。

㉕ 同⑩,卷2。

㉖②③ 《论议政》,《易言》(36)。

㉗ 《庸书外篇》,卷下议院。

㉘ 《新政真铨》。

㉙ 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步大略》。

㉚ 《庸书》商务。

㉛②④ 《盛世危言》,藏书。

㉜ 《易言》(20),西学。

(作者单位:衡阳师专)